贸易开放、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喻美辞[1]，郑金铃[2]

（1.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2.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将农村劳动力流动纳入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框架，研究了贸易开放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以及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的作用。研究得出，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的充分流动，纯粹依靠贸易开放难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沿海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较大，促进了贸易开放发挥收敛城乡收入的作用，然而在内陆地区，由于劳动力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除价格机制外，贸易开放还通过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引导外向型产业布局扩散、吸引外资流入等机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贸易开放；农村劳动力；劳动力流动；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304.8；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4)03－0052－10

一、引　言

以新古典贸易理论为基础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S-S 定理）为分析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S-S 定理在要素禀赋理论模型（H-O 模型）的假设条件下证明：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国家，其国内供给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上升，而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要素价格出现均等化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格局基本上反映了国内的要素禀赋状况。根据中国的要素禀赋以及 S-S 定理，贸易开放应当促进城乡劳动力的“价格收敛”。然而这一理论预测在中国并未完全成为现实，主要原因是 S-S 定理需要满足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这一重要前提，其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制约而得不到满足[1]。因此，有必要结合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一关键因素，研究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现有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部分学者认为，贸易开放提高了农民的实际收入，能够减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2-4]。也有学者认为，贸易开放提升了工业制成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削弱了农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5-7]。还有学者认为，贸易开放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 U”型[8-9]，是就业数量扩大效应和就业质量偏向效应的综合[10]。然而，在已有的研究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关注。本文认为，要研究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及其对这种影响的促进或抑制作用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将农村劳动力流动纳入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研究贸易开放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着重探讨农村劳动力流

收稿日期：2013－09－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JL040）；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联合项目（2012RL50502002）；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3WYXM0016）；华南农业大学“211 三期”青年项目（2012211QN04）

作者简介：喻美辞（1980—），女，湖北京山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E-mail：maisieyu@163.com

动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的关键性作用。由于中国各区域之间贸易开放度及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分区域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框架及假说

（一）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理论假说

1. S-S 效应。根据 S-S 定理，自由贸易会提高一国丰裕生产要素的实际收入，降低稀缺生产要素的实际收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按照 H-O 理论模型所揭示的模式进行，主要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一方面会增加对非熟练劳动力（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会随着出口产品价格的上升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从而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2. 贸易产品结构升级效应。贸易产品结构反映了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在一国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贸易产品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程度提高的表现。中国基于非熟练劳动力要素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工业制造业，导致工业制成品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在外向型制造业发达的城镇创造了大量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从而引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业。因此，如果农村劳动力没有转变为城镇居民，则贸易商品结构升级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如果农村居民的身份发生转换，则贸易商品结构升级引致的劳动力流动可能是统计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11]。

3. 产业布局扩散效应。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产业集聚和扩散取决于向心力（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和离心力（市场拥挤效应）的共同作用[12]。在封闭条件下，分散的农业人口及有限的市场潜力对制造业向农村地区扩散产生了离心力。当贸易开放后，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扩散，制造业逐渐在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的沿海地区集聚，并向临近海外市场的地区扩散，形成了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的产业布局模式。对外开放后中国制造业在临近海外市场的东南沿海城市及其城郊地区集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产业的集聚和扩散会引起地区间产出的差异，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条件下，集聚区域与外围区域的收入差距往往会扩大[13]。

4. 外资流入效应。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外资企业大多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生产性企业，投资的行业也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相对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投资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城镇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为中国农村的非技术性或低技能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岗位，提高了他们在城镇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做出了巨大贡献。

理论假说 1：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贸易开放将通过 S－S 效应、贸易产品结构升级效应、产业布局扩散效应、外资流入效应等机制创造就业岗位，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提高其收入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及假说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户籍政策的不断松动，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差异引起的预期工资收入的差异导致劳动力持续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理论上讲，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通过以下效应影响城乡收入分配：

1. 劳动生产率效应。由于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规律，在不改变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城镇非农业部门，逐渐缩小两个部门间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差异，进而促进城乡收入的收敛。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是缓和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力量。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一方面，流入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将获得高于原来在农业部门的收入；另一方面，农民将增加人均土地的拥有量，有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从而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7]。

2. 城乡劳动力分工合作效应。劳动力边际生产效率递减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从事相同职业,假设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从事不同职业,就可以形成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部分抵消劳动力数量增加导致的城镇劳动力边际生产率递减[14]。随着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专业化分工已深化到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或工序。由于城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技术熟练程度相对较高,主要从事技术密集型生产工序,农村劳动力则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因此,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镇实现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在各自岗位上分工合作,互惠共赢,这将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①。

3. 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通过"干中学"效应和降低生育率等途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5]。而且,流向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为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报酬更高的就业岗位,往往会接受职业教育或者在职培训,从而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收入。

理论假说2:由于边际劳动生产效率递减,农村劳动力流动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使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这个条件不满足,城乡劳动力也可以在各自岗位上分工合作,并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的关键性作用

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或产业间流动和配置是决定国际贸易利得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劳动力要素能否大规模地流动和合理配置自然成为决定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关键因素。如果农村劳动力要素可以在城乡之间和产业之间实现大规模地自由流动,贸易开放将通过促进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提升贸易产品结构、推动外向型制造业空间布局扩散、吸引外资流入等渠道,吸纳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地区的非农业部门就业,提高其非农收入。如果农村劳动力缺乏足够的流动性,首先,相对农业而言,高度集聚于城镇的制造业能对城镇劳动力支付更高的工资,结果便是制造业贸易扩大了制造业工人(主要是城镇居民)与农民的收入差距;其次,城乡劳动力市场供需会不平衡,农村劳动力也难以充分享受到贸易开放所带来的收益,贸易开放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则会部分地被抵消;最后,城乡之间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要素禀赋差异,从而单纯的商品自由贸易难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理论假说3:农村劳动力能否充分流动是决定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农村劳动力可以从农村向城镇充分流动,贸易开放将有效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果农村劳动力缺乏足够的流动性,贸易开放将难以充分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和假说,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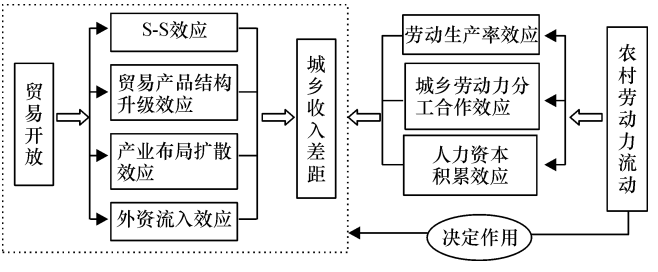


图1 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① 当然,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流向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当地劳动力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事实上,由于受教育程度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以及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歧视,农村劳动力很难实现对城镇劳动力的替代。

三、计量模型、变量介绍及估计方法

（一）计量模型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及假说，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 IG_{it} = \alpha + \alpha_i + \beta_1 \ln Trade_{it} + \beta_2 \ln LMob_{it} + \sum_k \gamma_k \ln Z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IG* 表示城乡收入差距，*Trade* 表示贸易开放度，*LMob* 表示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Z* 是一组控制变量。α 是常数项，α_i 代表未观测的个体效应，γ_k 是控制变量的回归函数，ε_{it} 是随机扰动项。近年来一些经验研究证实，外资开放度（*FDI*）、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实际 *GDP*）、城市化进程（*Urban*）、政府财政支出结构（*Gov*）、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State*）等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16-18]。只有将这些因素（或变量）控制好，才能准确反映贸易开放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因此，在模型（1）中引入这 5 个控制变量非常必要。

模型（1）中的回归系数 β_1 和 β_2 分别反映了贸易开放和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单一影响，未考虑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的作用。如果回归系数 β_1 显著为负，则意味着贸易开放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符合理论预期。考虑到不同区域贸易开放度的差异，分沿海和内陆两大区域进行估计。为了刻画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的关键性作用，在模型（1）中引入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得到如下计量模型：

$$\ln IG_{it} = \alpha + \alpha_i + \beta_1 \ln Trade_{it} + \beta_2 \ln LMob_{it} + \beta_3 \ln LMob_{it} \ln Trade_{it} + \sum_k \gamma_k \ln Z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模型（2）中的系数 β_3 刻画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的决定作用。如果 β_3 显著为负，说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促进了贸易开放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也分沿海和内陆两大区域进行分析。为了反映贸易开放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作用机制，在模型（2）中引入贸易产品结构（*Stru*）、海外市场接近度（*FMA*）①、外资开放度（*FDI*）等变量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进一步将计量模型设定为：

$$\begin{aligned} \ln IG_{it} = {} & \gamma + \lambda_i + \beta_1 \ln Trade_{it} + \beta_{11} \ln Stru_{it} \ln Trade_{it} + \beta_{12} \ln FMA_{it} \ln Trade_{it} + \\ & \beta_{13} \ln FDI_{it} \ln Trade_{it} + \beta_2 \ln LMob_{it} + \beta_3 \ln LMob_{it} \ln Trade_{it} + \sum_k \gamma_k \ln Z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3)$$

模型（3）中 γ 是常数项，λ_i 是未观测的个体效应，β_{11}、β_{12} 和 β_{13} 分别刻画了贸易开放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二）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IG*）。目前主要采用三种方法度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其中泰尔指数直接度量的是城乡收入差距，而且对高收入和低收入者收入的变动比较敏感，本文运用泰尔指数测算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测算所需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 解释变量贸易开放度（*Trade*）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LMob*）。采用外贸依存度这一指标对各省市、各区域的贸易开放度进行度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劳动力流动很难找到完美的度量指标，目前比较公认的办法是通过人口流动来反映劳动力流动。然而，农村劳

① 贸易开放使制造业布局趋于扩散，有助于大城市与靠近海外市场的边境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因此，本文引入海外市场接近度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以捕捉贸易开放通过促进外向型制造空间布局扩散这一机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动力流动只是人口流动的一种形式,因此这种办法不能准确反映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沈坤荣等运用各省份农村移民(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占本区域城镇从业人员的比重来测算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19],这种方法准确衡量了各省份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所占比例。本文采用这种方法测算各省市1996—2006年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由于《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自2007年之后未报告各地区城镇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规模的数据,本文利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增加来源(从农村)"指标,通过逐年累加,得到2008—2010年城镇单位使用的农村劳动力规模。

3. 控制变量。外资开放度(FDI),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实际GDP),用GDP价格指数对名义GDP进行平减得到。城市化进程(*Urban*),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政府财政支出结构(*Gov*),用农业的财政支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表示。非国有经济比重(State),是个制度变量,用非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占职工总数的比重表示。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

4. 其他变量。其他变量包括贸易产品结构(*Stru*)和海外市场接近度(*FMA*)。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以各地区工业品出口额与农产品出口额之比衡量贸易产品结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借鉴袁冬梅等的数据处理方法[4],将FMA乘以各省份每年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得到海外市场接近度FMA,其中省会城市(直辖市)之间的公路距离从中国公路信息服务网上读取,各省区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地方概览网站。

(三)估计方法

本文采用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既从全国层面进行估计,也依据各区域贸易开放度和劳动力流动程度的差异,分沿海和内陆地区进行估计。值得说明的是,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一变量是内生的。这是因为,首先农村劳动力流动在空间上不是随机分布的,而是具有选择性,农业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引起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制度障碍,而这些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因素通常因为难以完全控制而被包含在误差项中,从而使得劳动力流动变量与误差项相关。为了解决内生性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对模型进行工具变量估计。

四、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贸易开放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

不考虑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中的作用,对模型(1)进行估计,以刻画贸易开放和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单一影响。为获得稳健性的估计结果,既运用全国层面的面板数据,也运用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数据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基于全国的数据,还是基于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数据进行估计获得的结果都显示,贸易开放度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但不显著,这意味着贸易开放并未显著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回归系数在三个样本下都显著为负,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自身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贸易开放并未促进城乡收入的收敛,理论假说1并未得到验证。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贸易开放收敛城乡收入所要求的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一条件受到中国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制约未得到满足;第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需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体系尚未完善,体制的不完善使得城乡收入差距难以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从回归结果也可以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2。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劳动力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农村劳动力向边际生产率

较高的非农业部门流动，使得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别缩小，从而城乡收入差距也将缩小。事实上，只有反映从事农业产业的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的这种特定结构性变化的流动，并且劳动力流动没有制度性障碍，才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农村劳动力主要是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业部门。这既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也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增加了农民的农业收入。第二，流向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与城镇劳动力在不同岗位上进行分工合作，并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由于农村劳动力在受教育程度和技术熟练程度上与城镇劳动力存在差异，他们之间是互补的不是替代的，他们往往从事不同的职业或不同的生产工序。作为劳动力流动的结果，目前从农村流入的劳动力已在城镇就业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城乡劳动力在不同岗位上的分工合作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而且，流向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在城市接受了一定的职业技术教育或企业提供的在职培训，从而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并获得更高的收入。第三，农村劳动力流动仍然存在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制度性障碍。改革开放后，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户籍制度虽有所放松，但尚未实现根本性的改革，从而使得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户籍制度所抵消。模型(1)中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回归系数 -0.0274 显著为负，意味着尽管存在户籍制度的约束，农村劳动力流动仍然可以通过前面两种机制促进城乡收入的收敛，而且这种作用没有全部被户籍制度的约束所掩盖。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修正经济发展和贸易开放过程中的城乡收入分配不均等的一种有效机制，理论假说 3 得到了验证。

表 1　计量模型(1)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全国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Constant	-0.3071(-1.22)	-0.0270(-0.78)	-0.0250(-0.71)
ln*Trade*	-0.0174(-1.17)	-0.0100(-0.79)	-0.0788(-1.57)
ln*LMob*	-0.0274*** (-8.04)	-0.0191*** (-5.48)	-0.0420*** (-5.73)
ln*FDI*	0.0451(0.69)	0.1292** (2.22)	-0.3345** (-1.94)
ln*GDP*	0.0404*** (9.61)	0.0387*** (5.60)	0.0439*** (7.11)
ln*Urban*	0.1912*** (5.04)	0.2583*** (5.50)	0.1473*** (2.51)
ln*Gov*	-0.2598*** (-4.30)	-0.2654*** (-3.21)	-0.1337(-1.49)
ln*State*	-0.0308*** (-4.05)	-0.0001(-0.99)	-0.0520*** (-4.99)
R^2 值	0.5952	0.6735	0.5893
样本数	435	165	270

注：回归系数后面括号内为 t 统计值，“***”、“**”、“*”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的作用

在模型(1)中引入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分离出贸易开放、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农村劳动力流动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的作用，得到模型(2)的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首先，从全国数据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贸易开放度的回归系数 -0.0104 为负，但仍不显著，说明如果缺乏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纯粹依靠商品的自由流动很难熨平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农村劳动力流动自身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理论假说 2 进一步得到了支持。两者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0.0015 为负，但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第一，中国的贸易开放没有引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镇，从而城乡收入差距并未显著缩小；第二，从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不足抑制了贸易开放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基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贸易开放度较高的沿海

地区流动、户籍制度的存在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等事实,第二种解释更具说服力。

比较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自身能够促进城乡收入的收敛,如果缺乏农村劳动力流动,单纯依靠贸易开放难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总体不足,使得贸易开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未能完全得到释放。中国是一个非熟练劳动力(主要是农村劳动力)要素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根据 H-O 模型和 S-S 定理,在劳动力可以充分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中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进口熟练劳动密集型商品可以促进城乡劳动力的"价格收敛"。然而,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户籍制度的存在以及由其所引起的城乡劳动力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不平等,中国农村劳动力尚未实现充分流动,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享受到贸易开放所带来的收益。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如果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足,贸易开放将难以充分释放收敛城乡收入的作用,即理论假说 3 得到了验证。

表 2 计量模型(2)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全国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Constant	-0.0330(-1.16)	-0.1251**(-3.29)	-0.0030(-0.06)
ln*Trade*	-0.0104(-0.27)	0.1295***(3.81)	-0.3017(-0.95)
ln*LMob*	-0.0265***(-4.11)	-0.0307**(-2.56)	-0.0508***(-2.91)
ln*LMob* · ln*Trade*	-0.0015(-0.19)	-0.0323***(-4.29)	0.0652(0.72)
ln*FDI*	0.0416(0.62)	0.1158**(2.33)	-0.3168*(-1.77)
ln*GDP*	0.0399***(7.87)	0.0267***(3.89)	0.0455***(6.15)
ln*Urban*	0.1939***(4.85)	0.3074***(7.39)	0.1450**(2.40)
ln*Gov*	-0.2639***(-4.01)	-0.3420***(-4.69)	-0.1341(-1.46)
ln*State*	-0.0307***(-4.04)	-0.0063(-0.69)	-0.0532***(-4.88)
R^2 值	0.5969	0.7647	0.5706
样本数	435	165	270

注:回归函数后面括号内为 t 统计值,"***""**""*"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其次,从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回归结果来看,在分离出贸易开放、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之后,对比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结果,主要有以下两点发现:

第一,即使是贸易开放度较高的沿海地区,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单独依靠商品自由贸易仍然难以熨平城乡收入差距。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沿海地区贸易开放度变量的回归系数 0.1295 显著为正,内陆地区贸易开放度变量的回归系数 -0.3017 为负,但不显著,说明纯粹的商品贸易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事实上,由前文综述的研究结论可知,如果不伴随农村劳动力的充分流动,贸易开放自身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沿海地区纯粹的商品自由贸易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在于,沿海地区的贸易开放程度较高,吸引了大量的资本、技术和高端人才的流入,从而造就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提高沿海地区城市居民的收入。内陆地区由于贸易开放度较低,如果缺乏农村劳动力的充分流动,贸易开放自身难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差异,沿海和内陆地区的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在沿海地区样本估计中显著为负,在内陆地区的样本估计中却为正,但不显著。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差异源于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区域差异。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流入,使得贸易开放有效缩小了沿海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内陆城市由于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以及配套产业、软硬件设施等区位条件相对落后,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

远低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城市，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向内陆城市的规模较小。实证研究中发现，1996 – 2010 年间，我国沿海地区的年均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是内陆地区的 2.3 倍。内陆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足阻碍了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的收敛作用的释放。这一实证检验结果进一步为理论假说 3 提供了经验证据。

（三）贸易开放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

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贸易商品结构、海外市场接近度、FDI 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等变量获得的，刻画了贸易开放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用全国层面的面板数据对模型（3）进行估计，得到如表 3 所示的估计结果。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0.0213 为正值，而且在 5% 的水平下显著，再次验证了前文的研究结论，即劳动力流动不足抑制了贸易开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贸易商品结构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 0.5165 显著为正，表明贸易商品结构改善并没有改善农民收入，理论假说 1 并未得到验证。原因在于贸易商品结构的改善通常伴随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农产品竞争优势的削弱，在短期内会造成农民工失业和收入减少，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海外市场接近度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 –1.4366 显著为负，说明各省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使外向型制造业空间布局得以扩散，有利于吸纳农村劳动力在更多的高收入地区和高收益部门就业，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FDI 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 0.5661 显著为正，表明贸易开放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减少了对低技术水平的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比较模型（3）和（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贸易商品结构升级、外向型产业布局扩散、外资流入等因素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

表 3　计量模型（3）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估计结果
ln*Trade*	–0.0954（–1.23）	ln*FDI*	–0.2345（–1.13）
ln*LMob*	–0.0322***（–4.90）	ln*GDP*	0.0405***（8.25）
ln*LMob* · ln*Trade*	0.0213**（2.00）	ln*Urban*	0.1543***（3.88）
$\ln Stru_{it}\ln Trade_{it}$	0.5165***（5.26）	ln*Gov*	–0.2574***（–4.04）
$\ln FMA_{it}\ln Trade_{it}$	–1.4366*（–1.65）	ln*State*	–0.0405***（–5.38）
$\ln FDI_{it}\ln Trade_{it}$	0.5661***（2.63）	Constant	–0.0411（–1.45）
R^2 值	0.6286		
样本数	435		

注：回归函数后面括号内为 *t* 统计值，“***”“**”“*”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三个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没有明显的区别。外资流入没有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目前吸引的外资主要流入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以及经济较发达、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城镇，而且外资企业通常雇佣更多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力（主要是城市劳动力），并支付较高的工资，从而拉大了城市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地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期阶段，而且政府政策带有明显的城市化倾向，从而有利于城镇居民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更高的收益。政府对农业的支出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现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21]。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出有利于农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城镇地区的国有经济非国有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居民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能否实现大规模地向城镇流动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如果农村劳动力可以大规模地从农村向城镇、从农业向非农产业流动,贸易开放将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如果农村劳动力缺乏足够的流动性,则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的收敛作用无法全部释放。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以及与对外贸易发展相适应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制度体系,纯粹的商品自由贸易难以熨平城乡收入差距。即使是在贸易开放度较高的沿海地区,商品自由贸易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在贸易开放度相对较低的内陆地区,依然存在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2)农村劳动力流动自身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贸易开放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中起关键作用。总体来看,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仍然不足,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的收敛作用未能全部释放。分地区来看,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农村劳动力流动已达到较大规模,促进了贸易开放发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然而,在内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以及区位条件落后,农村劳动力流动尚不充分,使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的收敛作用受到抑制。(3)S-S定理蕴含的价格机制并不是贸易开放影响城乡收入分配的惟一渠道,贸易开放也通过提升出口结构、引致外向型产业布局扩散、吸引外资流入等途径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给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进一步扩大内陆地区的贸易开放。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吸引外向型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和扩散,并形成产业集聚,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在提高城镇居民收入的同时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增长。(2)加快户籍制度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充分流动。近年来,虽然国家逐步改革单一的户籍制度,取消户籍制度的趋势更加明显,但是与户籍身份附着在一起的住房、教育、医疗等福利制度在城乡居民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性,这是了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因此,改革户籍制度,使农村居民享受到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待遇,保证外来农民工及其子女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对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流动进而发挥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的收敛作用意义重大。(3)完善对外贸易发展所需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制度体系。收入分配机制的完善,需要进一步完善所得税制,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一方面要继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另一方面要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改革社会保障的二元体制,实现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享受同样标准的社会保障。(4)推进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推动,需要建立劳动力配置和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化机制,实现劳动力就业机会均等和同工同酬待遇,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工资歧视。

参考文献:

[1] 王云飞,朱钟棣. 贸易发展、劳动力市场扭曲与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基于特定要素的短期分析[J]. 世界经济,2009,(1):3-12.

[2] 孙素梅. 对外开放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管理,2008,(3):108-109.

[3] 赵晓霞,李金昌. 对外贸易、FDI与城乡居民收入及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协整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2009,(2):55-65.

[4] 袁冬梅,魏后凯,杨 焕. 对外开放、贸易商品结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11,(6):47-56.

[5] 万广华,陆 铭,陈 钊. 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J]. 中国社会科学,2005,(3):17-26.

[6] 马少晔，应瑞瑶. 基于两种传递机制的贸易开放收入分配效应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2011，(7)：119 - 126.
[7] 毛其淋. 经济开放、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J]. 浙江社会科学，2011，(1)：10 - 22.
[8] 曾国平，王　韧. 二元结构、经济开放与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0)：15 - 25.
[9] 林　江，黄亮雄，孙　辉. 贸易开放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 U 型关系吗——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非参数估计[J]. 学术研究，2011，(5)：81 - 88.
[10] 魏　浩，赵春明. 对外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J]. 财贸经济，2012，(1)：78 - 86.
[11] 应瑞瑶，马少晔. 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 1993 - 2007 年重新估算的面板数据[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63 - 71.
[12] KRUGMAN P，LIVAS ELIZAOND R. Trade Policy and the Third World Metropoli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6，(49)：137 - 150.
[13] 袁冬梅，魏后凯. 对外开放促进产业集聚的机理及效应研究[J]. 财贸经济，2011，(12)：120 - 126.
[14] 钟笑寒. 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J]. 中国社会科学，2006，(1)：34 - 46.
[15] 郭剑雄. 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J]. 中国社会科学，2005，(3)：27 - 37.
[16] 黄国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09，(10)：15 - 25.
[17] 邓　伟，向东进. 转型时期的国有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J]. 财贸经济，2011，(9)：19 - 26.
[18] 盛　斌，魏　方.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J]. 当代财经，2012，(5)：85 - 93.
[19] 沈坤荣，佘吉祥.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J]. 管理世界，2011，(3)：58 - 65.
[20] 蔡　昉.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分析——解释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J]. 经济学动态，2005，(1)：35 - 39.
[21] 张义博，刘文忻. 人口流动、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J]. 中国农村经济，2012，(1)：16 - 30.

Trade Openness,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YU Mei-ci[1], ZHENG Jin-ling[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 framewor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trade openness with considering rural labor mobilit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s of trade openness and rural labor mobility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the role of rural labor mobility.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rural labor mobility plays a key role in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 of trade openness, if there is no large-scale flow of rural labor, it is difficult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simply relying on trade openness. In the coastal areas, the mobility of rural labor has reached a larger scale, which promotes trade openness and helps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However, in the inland areas, urban-rural income gap is still large due to small-scale labor mobility. In addition to the price mechanism, trade openness also influences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rough upgrading the trade commodity structure, diffusing th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 layout, and attracting foreign capital inflow.

Key Words: trade openness; rural labor; labor mobility; urban-rural income gap